

上接《E1

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

李友邦政治上受到冷落,固然与他不属于国民党嫡系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及“三青团”台湾区团部成员,大部分是经过长期抗日的知识分子,更多偏向台湾民众的立场,让趾高气扬的接收大员们非常不放心。当时岛内接收过程混乱,频频传出各种贪污腐败事件,李友邦接到部下报告,立即就转达给陈仪,请他赶紧整顿。但陈仪一概置之不理,反而怀疑李在故意找麻烦。

比如有一次,台湾西南部嘉义县一位干部向李友邦汇报,当地走私集团相当活跃,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李友邦随即向陈仪反映,陈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陈本人兼任总司令)参谋长柯远芬办理。不料柯非但不管,还把通风报信者的名字泄露给走私集团。结果,没过几天,那位尽忠职守的嘉义县干部,竟遭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

这类政府高官里应外合、集体腐败的现象,不仅让李友邦等人寒心,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那时候,台北有名的新中华、蓬莱阁等餐厅门外,一到夜晚,霓虹灯亮起,必定停满成排的轿车,车主是成群结队而来的政府官员,他们到这儿不用说都是花天酒地,左拥右抱。

再陷政争 英雄气短

李友邦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施抱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饱经风雨的一生中最大的厄运,正悄悄逼近。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岛内局势动荡,李友邦领导的“三青团”台湾区团部许多干部卷入其中,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台北民众发起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尝试与政府交涉。

面对民众愈演愈烈的反抗,陈仪指责“三青团”方面不与政府合作,有煽动“二二八事件”之嫌。到了三月二日,陈仪一面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一面想请李友邦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希望借他在台湾民众中的声望和影响平息事变。但李友邦予以拒绝,答复称“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法以三言两语讲清楚”。不用说,此举彻底得罪了陈仪。

“二二八事件”经国民党军队武力平息后,李友邦遭远芬逮捕关押,移送上海。后来全凭妻子严秀峰赶赴上海面见蒋经国,一一细述台湾的实际情况,以及李友邦在整个事件中的真实态度,才将他营救出来。而在整个事件中备受非议的陈仪,则被撤职赋闲。

一九四八年底,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力邀同为黄埔系的李友邦出

大宋朋友圈

苏东坡的“政治联姻”

文 / 李开周

一个人的朋友圈能有多大,主要不是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是否外向,而是取决于他的名声、地位和财富。

就拿苏东坡家族来说吧,以前世世代代都在眉山务农,圈子很小,亲戚和朋友网络无论如何出不了四川。幸好苏家有些田产,家底不算薄,到苏东坡的祖父苏序那一代,成了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的地主,再加上苏东坡的二伯父苏焕高中进士,才逐渐跟一些富家家族结缘。

苏东坡和苏辙兄弟俩发迹前,他们家最拿得出手的亲戚有两家:一个是眉山当地的程氏家族,一个是四川绵阳的文氏家族。

程氏家族发达较早,出过两个进士,其中一个做到夔州路转运使,相当于副省长。苏东坡的祖父苏序

而台北市主干道延平北路上有一家“延平阁”酒家,特意推出一道名菜叫“炒猪肝”,暗将国民党接收大员中的贪官比喻成猪,老百姓们恨不得吃他们的心,啃他们的肝。

当日,国民党的接收干部,倚仗手中权势,常常是“条子一贴”,



“台湾义勇队”中将李友邦戎装照。

山,接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陈自任主委)。

可是李友邦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施抱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饱经风雨的一生中最大的厄运,正在悄悄逼近。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败局已定,大批军政人员撤退来台,而岛上的反共、清共整肃,风声也一日紧似一日。当年年底至次年二月,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被破获,牵连出台湾共产党的几乎全部组织机构。中共台湾省工委张志忠的妻子季滢因与严秀峰认识,在特务的诱使下,打电话给严,约她出来见面,后者立即遭到逮捕。

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高层的李友邦,他的妻子如何与“共谍”之妻季滢有来往?严秀峰本人到底是否亦为潜伏的“共谍”?个中情节复杂传奇,有如大陆热播电视剧《潜伏》的续篇,值得另书一笔,暂且按下不表。

表面上看,李友邦暂时平安无事,但特务早已在他家附近的巷子口布哨,实行严密监视。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他偶尔会煮了鸡汤,装在保温瓶里带到监狱给严秀峰喝。妻子刚生下第五个孩子

就将老百姓的私宅、财产一网打尽。以至于台湾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于公,有专卖局、贸易公司;于私,假借各种名义征收民间物资据为己有。”

一九四七年初震动全台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失望的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怨恨心态的大爆发。

才八九个月,不久前发现又怀孕,偏偏突遇牢狱之灾,不幸小产,血流不止。他很担心妻子的健康,可事已至此,纵使她再不甘心,也只能一切听天由命。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李友邦独自带着孩子们在台北市郊北投的《新生报》宿舍中居住。十一月十八日早晨,一群宪兵突然闯入将他逮捕。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奄奄一息的他躺在担架上被押赴刑场枪决。

但国民党官方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一句话:这位黄埔二期出身的义勇队中将总队长,这位深受台湾民众拥戴的本土抗日志士,这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第二号人物,到底犯了什么罪?

临刑前不到半个月,李友邦才刚刚度过他的四十六周岁生日。

作者生于台湾台中市,诗人、作家、媒体人。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2016年推出简体版作品《一百年的漂泊:台湾故事》,获选为年度十大“华文好书”之一。本专题文章及图片均选自其新著《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8月出版),文字略有改动,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忘,继以新姻。”意思是二人因为上一代的亲戚关系而展开交往,后来又亲上加亲,让双方儿女结成婚配。但严格讲,跟文同结成亲家的并非苏东坡,而是他弟弟苏辙——苏辙的大女儿嫁给了文同的儿子文务光。

苏辙的女儿比较多,根据现有文献推断,他可能生了六个女儿,一个嫁给文同的儿子,一个嫁给曾肇的儿子,还有一个嫁给王正路的儿子。曾肇是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官至知府,相当于市长;王正路是副宰相王鞏的儿子,官至知州,也相当于市长。

苏辙与文同结亲,还是旧圈子的延续,但是他把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嫁到曾家和王家之时,却完全跳出了苏家上代的交往圈子,向上提升了一大步。

要知道,曾家是江西最了不起

历史复盘

“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

文 / 杨渡

尽管正当壮年的李友邦未能一展建设新台湾的抱负,反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但曾忠实追随他的每个台湾义勇队成员,仍然不时地回

台湾人有本事

首先是对敌宣传。义勇队成员长于日据台湾时期,因日本强制推行殖民教育,故他们皆通日语,战时反而成为有力的武器。平时在审问战俘、对敌喊话、翻译收集日军情报、收听广播等方面,得心应手,而队员中的知识分子,更能通过刊物上写文章、发表公众演讲、参与对敌政治工作等,为抗日出力。李友邦就曾说:“瓦解敌军和教化战俘,将是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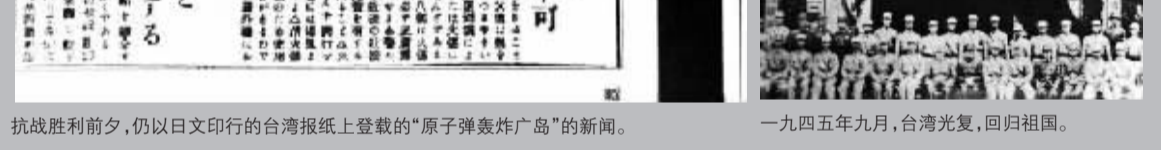
与大陆士兵相比,台籍青年对日本人的心态、生活习惯等了解较为深入,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派赴各抗战部队和各界战地工作团,战场上往往能收到奇效。

义勇队还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扬台湾沦为殖民地后的抗日革命历史,强调台湾革命与大陆革命互相呼应、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此种演讲与说明,有助于改变大陆军民对台湾人的刻板印象和片面了解,让大家明白,绝大多数台湾人仍然保持强烈的家国情怀,不能与少数甘心为日本侵略者做走狗的败类

相提并论。其次是医疗服务。台湾义勇队中医生人数甚多,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医生多达三十八位,所以李友邦也把医疗服务视为义勇队的工作重点。抗战时期,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伤病军民均甚多,医护人员及医药器材又极为匮乏,医疗队成了到处都急切盼望的重要力量。

起初,因人手和物资有限,台湾义勇队的医生们,只能组成医疗巡回队,奔波于我方控制下的浙江城乡各地。后来,终于在金华开设了第一家台湾医院。这家战地医院为军人和贫苦民众提供免费诊疗,对一般患者收取的药费亦仅为普通医院的七成,周边各地赶来看病者络绎不绝。医生们常常不得不从早忙到晚,有时候夜里十一点才能吃上晚饭。在战时的浙江,“台湾医生”家喻户晓,成了荣誉与赞赏的代名词。

台湾医院里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天深夜,医生都出去吃晚饭了,只留下并不懂医术的院长李友邦看家,偏偏这时来了一个腹痛难



抗战胜利前夕,仍以日文印行的台湾报纸上登载的“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新闻。

一九四五年九月,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少年强 中国强

台湾义勇队意义最深远的一项工作,当数成立“台湾少年团”了。

义勇队中有一群平均年龄不足十岁的孩子,多是由于家里大人要投入一线抗战或其他原因而无力照顾的,他们曾是李友邦最棘手的“难题”。教育本为少年儿童所必需,但艰苦而奔波的客观条件,让义勇队很难长期负担这一责任。于是,李友邦决定因时制宜,以培养年轻一代、储备未来干部为原则,组成“台湾少年团”。

“台湾少年团”为孩子们提供的主要课程,分为“教育”与“实际”两部分,前者有政治、军事、自然科学、台湾革命史、日文、英文及艺术训练等,后者则包括舞蹈、歌唱、绘画、墙报等,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合格后,即将这些少年团成员派赴各地参加抗日宣传。

来自殖民地的台湾孩子,往往能以家庭和自身受难的经历,被迫告别故乡流离失所的苦楚,来控诉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他们弱小的身躯,出现在浙江各地的街头,尽情诉说台湾故事,感动了许多民众,说服力比什么都强。这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极大的欢迎。《东南日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刊文称赞他们是“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

少年团团员在对日本战俘的反战宣传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跟一位名叫梅本原一的战俘聊天时,梅本想起自己的孩子跟前这帮稚气未脱的少年一般大,忍不住掏出家人照片看了看又看,竟然哭了起来。他在日本老家时是一名普通木匠,也搞不清为啥就被军

家、对社会、对民众有用的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李友邦发起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抗战期间贡献良多,大体说来有如下诸端,我们且一一道来。

忍的急诊患者,得知医生不在,便央求“要院长亲自看一看”,他当然不相信医院院长不会看病。李友邦见状,一边让人赶紧叫医生回来,一边前去探视。他摸了摸患者的肚子,询问一下病情,因实在不晓得如何下药,就在他的肚脐涂一些薄荷,权当安慰剂。孰料病人立马说:“好多了,好多了!”

“台湾医生”的医术与口碑不胫而走,继金华的首家台湾医院之后,几年里在浙江衢州、兰溪及福建建阳县,分别设立了第二、第三、第四台湾医院。台湾人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随着医术仁心的传播而逐渐改变。

第三,经济生产。战火破坏与物资短缺,使地方上支持抗战工业能力相当薄弱,义勇队中不乏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专家和技师,他们派人协助浙江各县市政府开办樟脑油流动工厂,因樟脑油可作汽车燃料用,效果不亚于柴油。又建起药品厂,生产军民急需的疟疾药水、药丸及胃药等。

方拉来中国参加“天皇圣战”。现在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中日两国的大人小孩,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最后,梅本原一下决心走到反战阵营中来。这是负责看守战俘的国民党部队军官都没想到过的事,因而对台湾少年团刮目相看,特地写信给义勇队大加赞扬。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健在的台湾少年团成员接受采访,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战斗岁月,依旧感慨万千。那位九岁时不得不哭别父母,跟随少年团的爱唱歌的小姑娘黄莘,六十多岁的人了,忆及李友邦时,还像女儿怀念父亲一样动情地说:

“他最喜欢抱着我坐在膝上,每次有委屈就去找他哭诉,虽然他很忙,待我们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做了高官,领袖文坛,声名显赫,无论社会地位还是江湖地位,都配得上。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门生,曾经想让自己的儿子娶东坡的孙女,结果没能如愿。苏东坡也曾经委托亲家做媒,要把堂兄苏位的女儿嫁给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结果也没能如愿。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双方都要互相考虑许多因素,例如相貌、人品、才华、门第,苏东坡之所以不答应黄庭坚的求亲,司马康之所以不答应苏东坡的求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门第不配。当然,苏东坡绝对配得上司马康,但他堂兄苏位默默无闻,碌碌无为,既非进士,也非名人,跟司马康是不般配的。

依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婚姻该由儿女做主,只要儿女们互相爱慕,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如果父母以门第和财富为理由去干涉,简直

恶俗之极。可是古代中国男女之间授受不亲,青年男女在成婚之前见面都困难,自由恋爱的概率自然更低,双方父母从旁代劳,肯定依照自己成婚多年的经验教训,只会考虑更加功利的因素,而不去考虑什么爱情。

最后,我们不妨再读读苏东坡这位不成功的媒人写给堂兄苏位的信中的一句话:

“君实之子名康,昨来明经及第,年二十一,学术文辞行检,少见其比,决可谓佳婿也。”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刚刚通过科举考试,今年二十出头,学问好,文章好,人品好,年轻人当中不可多得,将来前途无量,绝对是您首选的女婿。

你瞧,苏东坡夸了司马康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字涉及爱情。

作者为专栏作家,现居开封